

盛德堂和它的房客们

李景新



盛德堂遗址。本报记者 杨道 摄

量的历史遗迹。他积极交往,著书立说,吟诗填词,作书绘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胡铨亲自为吉阳军的学子讲学,以致黎族头领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他这里读书。胡铨成为在崖州推行中原正统教育早期最重要的教育家,他对崖州地区黎族子弟施行中原教育的开创之功,尤其不可磨灭。

裴氏宅,成了传播中原文化的重要平台。

秦桧病死,胡铨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五月离开吉阳军北归,后擢起居郎,官至兵部侍郎,卒谥忠简。

胡铨在盛德堂寓居八个年头,深感裴氏之厚德,于是想起《左传》中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盛德必百世祀。”于是为裴氏宅取名“盛德堂”,还亲自作了一篇铭文,其词曰:

猗欤休耶,偕守裴公。震风凌雨,大厦旒旌。迁客所庐,丞相起公。后来云谁,庐陵胡铨。三宿街恩,矧此八年。

访客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盛德堂曾住过赵鼎、胡铨两“房客”,便足以盛传千古了,何况裴氏之盛德与赵、胡之盛德进一步融合,使盛德堂名满海内,无数文人士大夫钦之仰之,纷纷以能够造访盛德堂,成为盛德堂的客人为荣幸,并为盛德堂献上诗文。其中有两个名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元相位至副宰相的王士熙,一个是明朝海南“吟绝”的王佐。

王士熙,字继学,北海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泰定朝由治书侍御史而升为中书参政,成为权力中枢的要员之一。泰定帝死后,发生“两都之争”,最终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战败,元文宗图帖睦尔获胜。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王士熙被流放吉阳军,次年年初到郡。王士熙到吉阳军之后,军使让他住在城中居住,但

具存亡状”,就是每月都要上报一次赵鼎是死是活的文件。赵鼎不甘于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的迫害,又担忧家人因己而祸,遣人告诉远方的儿子说:“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遂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绝食而终。临终前自书铭旌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表现出宁死不屈的刚强气节。后来胡铨作《哭赵鼎》诗而赞曰:“一丘孤冢留穷岛,千古高名屹泰山。”

高宗去世后,孝宗朝重新清点历史,赵鼎被平反,追封为丰国公,赠太傅,谥忠简,成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在崖州,赵鼎被列入五贤祠加以奉祀,又被奉祀于海口五公祠。

房客胡铨是崖州施行中原教育开创者

三年后,裴氏宅迎来了第二位“房客”——胡铨。胡铨,字邦衡,号澹庵,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曾任枢密院编修,以《戊午上高宗封事》著称,文中坚决反对议和,乞斩秦桧。秦桧给他加上“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编管昭州、新州。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一月,胡铨又被贬到吉阳军。

绍兴十八(1148年)正月,胡铨到达吉阳军贬所。如三年前对待赵鼎一样,裴文义仍然冒着身受牵连的危险,请胡铨住进了裴氏宅。

胡铨寓居裴氏宅时,官职并不大,但是他对当地乃至整个海南文化的影响力却不小。他在途经临高县时,就为县令谢渥题写茉莉轩,并为学子开讲《春秋》大义,发现澹庵杜门谢客,但由于广西帅张宗元馈赠糒米,秦桧得知后命令吉阳军“月

址从南漏村迁到水南村,后来被命名为盛德堂的裴氏宅由此诞生。

一代名相赵鼎终老之所

绍兴十五年(1145年)春,崖州城迎来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耆老。他白发苍苍,形容憔悴,只有那神气不减的炯炯目光,标示着这是一位不凡的人物。他曾是一代名相,姓赵,名鼎,字元镇,号得全居士。

赵鼎在南渡之后曾两度为相,力主抗金,督促宋高宗,亲总六师,临江决战,使强势的金人闻风丧胆,使南宋出现中兴局面。但他并非一个彻底的主战者,迫于高宗压力,曾主持与金人议和。但是在议和过程中,始终坚持民族气节,与金人进行激烈争执,引起高宗的不满。奸臣秦桧则借机构陷,赵鼎接连被贬谪的命运从此开始。绍兴十四年(1144年)十月,赵鼎在潮州贬所接到再贬吉阳军的谪命,次年春抵达吉阳军贬所。

已在昌化军任知军的裴文义得知之后,毅然将自己的宅院提供给赵鼎居住。他明明知道,秦桧迫害政敌不择手段,且无比残酷,接纳赵鼎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祸端。

虽然有了裴氏宅作为贬谪生涯的安身之所,但是赵鼎崖州三年,身心仍然遭受了极大摧残。赵鼎性格耿介倔强,他到崖州后给朝廷上谢表曰:“白首何归?惟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而不移。”秦桧见后,狞笑着说了一句:“此老倔强犹昔。”于是迫害更加疯狂。赵鼎虽杜门谢客,但由于广西帅张宗元馈赠糒米,秦桧得知后命令吉阳军“月

王士熙感觉居所过于完美,乃借居于城西陋地茅屋,名之曰“水北新居”。又在茅屋附近筑江亭,为游息之所。王士熙性格恬淡、温和、谦恭、宽厚,常常静居一室,数日不出中庭,恬然不见其去国之意。郡中人士多喜与他交往,他都甚加礼貌。他对于郡县时政,从不妄加议论。不是公事和宴请,他都不轻易出门。大约在本年冬天,遇赦许归田里。后复起用,死于任上,谥号文献。

王士熙虽喜静居,且居崖州时间不长,但又怎能与盛德堂擦身而过。一则赵鼎、胡铨是他敬仰的人物,又有被贬崖州的共同命运;再则盛德堂之美德至元代依然不衰,裴豫的五世孙裴豫很快表示出对这位谪客的友好和敬意。裴豫同他的曾祖善待赵鼎、胡铨一样善待王士熙,很快把王士熙从水北住所邀请到水南盛德堂做客。王士熙感而为赋《题盛德堂二首》:

洛下当年将相乡,海南一种玉芝香。青云只照堆床雪,白日长留听讲堂。断筒灯花秋对雪,古垣蛩迹夏凝霜。文鸳早奋丹山翼,舜乐于今动八荒。

唐家晋国擅功名,二叶诸孙海外行。盛德有堂留客住,故乡无地待春耕。青毡千古诗书在,绿野孤云草棘生。投我骊珠惊入手,爱才怀古不胜情。

海岛北部临高县的王佐有没有到过盛德堂,不得而知,但他的心切切实实地到了盛德堂,为之作《崖州裴氏盛德堂》咏道:

晋国亡来六百年,云初今见海南边。风流尚是元和脚,主客谁同南渡贤。落落朱崖余栋宇,盈盈绿野旧风烟。我怀三姓上千古,欲向杭州问老天。

作者王佐自己加按语云:“裴氏,晋公度孙也。赵忠简公鼎、胡忠简公铨谪崖时皆住此堂,李参政光时相往还。裴祖闻其在宋守昌化军,即儋州,儋在隋为朱崖郡。”李光一直居于琼州和儋州,并没有到过崖州,但作者特意注明有李光相往还。诗中的“三姓”,本指赵鼎、李光、胡铨,都是秦桧切齿痛恨的,秦桧将三人姓名写在自己的阁中,以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非常有意思的是,王佐在“我怀三姓上千古”句后自注云:“秦桧于天章阁书胡、赵、裴三字。”分明将“三姓”理解为胡铨、赵鼎和裴文义了,一下子把裴文义提升到了李光的地位。由此可知,裴氏也在秦桧憎恨之列,倍增其正直仁义之德。王佐从裴度写起,而延伸到宋代同被秦桧所迫害的赵、胡、李、裴,则其所怀、所念、所赞,实包括了与盛德堂有关的全部唐宋名贤,以及盛德堂的主人。

鲁迅的号召力和包容心

姚秦川

1926年底,鲁迅辞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一职,前往中山大学任教。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姓张的学生,对鲁迅甚是“顶礼膜拜”,不管鲁迅走到哪里,他都要跟到哪里,简直成了鲁迅的影子。鲁迅虽然对此有些无奈,但他并没有说对方什么。

第二年8月,鲁迅离开广州奔赴上海,他当时以为那位姓张学生应该不会跟随着自己一起同行,没想到,对方不但跟着他一起来到上海,同时希望鲁迅能收留自己,并且还要“管吃管住”。鲁迅着实有些哭笑不得,但他又不想伤害这位年轻人,最后还是接受了对方的“无理要求”。此时,这位同学看鲁迅处处照顾自己,“大约以为”鲁迅把自己当成了儿子,于是,又毫不客气地找了一位女朋友,一起搬过来住。张姓同学不仅要求鲁迅为他们两人提供衣食住行,而且还要求鲁迅“一定要为自己谋一条出路”。

鲁迅因为刚来上海,认识不了几个用人单位。不过为了那位同学的前途着想,一向不爱求人的鲁迅还是出门找几个熟人帮忙,遗憾的是那几个熟人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话。走投无路之际,鲁迅实在没有办法,便找到好友郁达夫,让他“无论如何,为这位青年去谋一职,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的工作”。看到鲁迅一副无奈的神情,郁达夫表示自己一定尽力而为。

时间不长,郁达夫向现代书局说好此事,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雇佣这位青年。然而令鲁迅意外的是,就在此时,那位青年却又觉得跟着鲁迅“看不到任何前途”,最后带着爱人“脱离鲁迅而走了”,这种结局令鲁迅再次哭笑不得。

事后有人问鲁迅,很明显这个年轻人是利用了你的同情心欺骗了你,可你为何还要不遗余力地去帮助对方?鲁迅则平静地回答:“年轻人的自尊心很强,我们不能直接去批评对方,而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成长,这些都是我们为老师师的己任。”

到了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后,为了将新的文学主张扩大宣传,让更多的年轻学子喜欢上新文学,当时,鲁迅和郑伯奇被分配到沪西大夏大学进行演讲。

演讲当天,大夏大学的礼堂里挤满了人,甚至一些外校的学生也从大老远跑来。不过,绝大部分学生都是为了瞻仰鲁迅的言论风采才来听演讲的。那天由郑伯奇首先开讲,他讲的是文艺与阶级关系的问题,也许讲得太平淡,演讲才进行了不到一刻钟,听众便离开了一大半,只剩下寥寥百十个人。如此尴尬的情景之下,郑伯奇只好草草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接下来轮到鲁迅上场了,因为他当时已抱病多日,所以讲话的声音并不高,不过却很沉着,语调也很平缓缓慢,像是跟自己人谈论家常一样亲切。一开始,鲁迅先是从自己的家乡谈起。鲁迅说,自己是浙东一个产酒名区的人,那里生产好几种有名的白酒,不过自己却并不爱喝酒。如此一来,鲁迅对于曾经说他“醉眼朦胧”的人轻轻地回敬了一下。接着,鲁迅谈论到自己家乡的风俗,他风趣地表示,在他的家乡,年轻人到了讨媳妇的时候,并不需要什么杏脸柳腰的美人,而是要那种腰臂圆壮、脸色红润的健康妇女,这一类妇女不但勤劳,而且会过日子,当然也就最“抢手”了。由这类的例子,鲁迅于是归结出农民与绅士对于美的观念的不同,当然寻求配偶的“目标”也会有所不同。最后,鲁迅还用实例揭破了“美是绝对的”这种观念的错误,而给“美的阶级性”这种思想找出了根据。

在朴实的话语中,鲁迅时而风趣幽默,时而露出讽刺的光芒。而每一个讽刺的利箭在投射到大众中间时,便会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有趣的是,不知什么时候,礼堂里竟然又回归了许多听讲的人,就连中间和两边的过道也被人群挤得满满当当,由此可见鲁迅的号召力在当时非同小可。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次演讲结束后的第二天,大夏大学马上成立了一个进步的文学组织。时间不长,其他大学也跟着纷纷成立文学社团,这不得不说是鲁迅抱病演讲的功绩。

一个人的魅力不仅仅体现在强大的号召力上,更体现在对犯错之人的包容上,鲁迅无疑同时拥有了这两个优秀的品质。

文史荟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



海口五公祠中赵鼎雕像。(资料图)

海口五公祠中胡铨雕像。(资料图)

海南岛三亚市有个古老的崖州城,崖州城外有个灵气十足的水南村,水南村有座存在八百多年的老屋,这座老屋虽然今存只有三面老墙托住半个屋顶的残迹,却牵动着无数人的崇古之心。这间老屋曾是北宋之交海南岛南部最为“华贵”的名宅,后来因寓居过两位著名“房客”,于是拥有了这个敦厚而响亮的名字:盛德堂。

盛德堂为大宰相之孙所建

盛德堂的主人叫裴文义,裴文义因父亲裴豫在吉阳军任知军而拥有了坐落在海南岛最南端的家。

唐宋时被派到海南岛做官的人绝对不是得志之人,但裴豫的先祖却是十分得志的唐著名宰相晋国公裴度。裴豫于北宋宣和至南宋绍兴年间在琼州海峡北岸做官,政绩不错,任满后要回朝廷觐见皇帝,却没有按时到达,皇帝大怒,于是裴豫被发派到吉阳军(崖州)任职。任职期间,清正廉明,深得人心。吉阳军任满之后,又恰逢中原战乱不断,于是他决定干脆留在崖州,选个南漏村定居下来。那个时候的吉阳军文化还十分落后,不要说无法与中原的州县同日而语,就是与海岛北部的琼州(如今的海口地区)和昌化军(如今的儋州)相比,也是黯然失色。在这环境下,他优秀的儿子裴文义并没有在科举途中获得成功。但是由于裴豫政声卓著,裴文义便获得一个荫补的官位,被派到昌化军担任军使。《儋县志》载:“裴文义,吉阳县人,绍兴间任,有善政,历久卒于官,百姓悼之。”可见裴文义的品德和政声与乃父相当。裴文义把家庭住

顾恺之《洛神赋图》

局部

在现存的中国古代绘画中,《洛神赋图》被认为是第一幅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画作。据说是顾恺之在某一天偶然读到友人送来的三国时代文学家曹植写的《洛神赋》有感而作的。全卷分为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

顾恺之所处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战乱频繁,复杂多变而又分裂的时期。政治的不稳定、时局的混乱动荡,虽带来了经济的普遍衰退,却反而前所未有的丰富了文化的内容和内涵。这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一个自由解放、富于智慧和热情的时代。

《洛神赋图》以长卷连环画形式展开,画中反复出现曹植与洛神的形象,将《洛神赋》中从相慕到相离的故事巧妙地串联起来,实现了不同时间、空间的变幻。表达了作者不得不“归乎东路”了,但仍“揽騑辀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的情怀。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张岱笔下的蹴鞠

孟祥海

明末文学家张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岁之前,他爱好的事物达30余种,且每一种他都玩到了极高的水平,这里面就包括“蹴鞠”。

《陶庵梦忆·扬州清明》中写道:“扬州清明日,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青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弹琴……”可见,“斗鸡蹴鞠”,常见于街头巷尾,已成为明末一种很普遍的群众性运动。

当时的梨园子弟多爱玩蹴鞠,张岱也如此。他常混在自家戏班伶人里,玩得不亦乐乎,常忘掉主人家身份。因此,他深谙蹴鞠的技术与脚法,融之于文,也是异彩纷呈。比如《严助庙》一文中写道:“天启三年,余兄弟携南院王岑,老串杨四、徐孟雅,圆社河南张大来辈往观之。到庙蹴鞠,张大来以‘一浑泥’一串珠”名世。球着足,浑身翻滚,一似粘黏有胶、提掇有线,穿插

有孔者,人人叫绝。”张大来的脚法和技法,可谓出神入化,张岱与这些人整天在一块玩,那水平自不一般!

朋友祁正祥也擅蹴鞠。《祁正祥癖》一文中写道:“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友祁正祥有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凡事以“癖”蔽之,投入之深可以知之。张岱这话虽是写朋友的,用于自己也是完全可以的。

在一卷冰雪文后序》中张岱写道:“自弹琴拨阮,蹴鞠吹箫,唱曲演习,描画写字,作文作诗,凡百诸项,皆藉此一口生气。得此生气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气者,终成渣秽。”可知,“蹴鞠”对他而言,是多么重要的一种爱好!

张岱不仅是一流的文学家,也是一位真正的大玩家。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管玩什么,都能乘兴而来,兴尽即去;能将癖好玩到极致,也能及时抽身!

向蒲松龄学习著作权意识

孙建清

近日,偶读学者马瑞芳旧著《蒲松龄评传》,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聊斋志异》手稿的署名问题。研究表明,有清一代,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时谈狐说鬼以为时尚。当大家知道蒲松龄正在写《聊斋志异》时,都很热心地把自己的见闻提供出来,为记朋友赞助之功,蒲松龄常在篇末记下故事的具体来源,比如《侯静山》是高念东所述,《咬鬼》是李生所讲,《胡四相公》是莱芜张虚一所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蒲松龄的为文之道,颇能给人一些启迪。

众所周知,博采民间传闻,朋友口述异闻或者邮箱相寄,是《聊斋志异》材料来源之一。在蒲松龄将他人的记载或口述作品进行再加工的过程中,并没有掠人之美,而是在手稿的末尾认真地写上故事提供者的名字,这是值得称道的。据考证,《聊斋志异》中取材前人野史佚闻的故事约有百篇之多。蒲松龄收集民间传说,进行艰苦的艺术加工,使《聊斋志异》成为不朽的名著,不仅凸显了作家运用民间文学素材的能力,而且也彰显出蒲松龄对朋友、对口述者、对原创的尊重,折射出古代小说家初始的著作权意识。

蒲松龄对待手稿的做法,令人钦佩。几百年前,还没有著作权法,也尚无保护知识产权一说。在当时,蒲松龄设茶摊听来的故事,完全可以略去故事的讲述者,大大方方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以一个记述者、整理者的姿态出现,由此可见,三百年前的蒲松龄已经具备了原始的著作权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知道,蒲松龄完成的《聊斋志异》,其手稿俱藏于家,无力梓行,直到他辞世五十年后才由后人刻印。现行的《聊斋志异》版本,虽然看不到署名故事来源的做法,但这已不是蒲松龄本人所能左右的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时,其手稿的确是记录了“朋友赞助之功”的。由此想到,保护知识产权,增强著作权意识,应向古代作家学习,应从小事做起。譬如有些报刊常常在文末注明“某某对本文有贡献”之类的鸣谢,就很有必要。

总而言之,在文墨诉讼官司纷起的当下,如何对待别人的劳动成果,如何尊重原创,如何使用前人的材料,蒲松龄的手稿署名很有借鉴意义,不啻今人的一面镜子。

(据《中华读书报》)